

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早期译介与传播¹

李慧君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长沙 411083)

【摘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外来思想译入与传播的成功典范，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译介与传播是其在我国得以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环节。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译介与传播经历了自发、自觉、有组织地译介与传播三个阶段，具有鲜明的实践性、选择性和革命性，促使湖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群体形成，推动了后期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党的成立。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早期译介与传播，从历史源头探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能为新时代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占领舆论高地提供理据支撑，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百年党史寻根提供重要参考。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湖南；早期译介与传播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 (2022) 06-0020-09

【DOI】：10.16479/j.cnki.cn43-1160/d.2022.06.001

马克思主义是百余年来对中国社会产生最重要影响的外国思想理论，这一学说如何传入中国，进而成长为主流意识形态值得深入探察。马克思主义在湖南地区的译介与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传播并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环节。

一、马克思主义在湖南早期译介传播的历史进程

“一部近代史，半部湖南书”，近现代百余年间，中国内乱不绝，外患频仍，一大批湖南人挺身而出，成就了“湘省士风，云兴雷奋”、“举世无出其右”的景象，如梁启超所言“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1]。二十世纪初，湖南早期“睁眼看世界”的传播者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早期传播经历了自发、自觉和有组织地译介与传播三个阶段，从1902年湖南武陵人罗大维翻译《社会主义》持续到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早期传播全面陷入低潮。19世纪末，最初的民主革命思想从译文和译本开始传播。1897年至1898年，维新派人士先后在全国各地建立起众多译书机构，创办大量刊物报纸，翻译出版相关译本读物。当时在湖南有《湘学新报》、《湘报》、《博文报》等，这些刊物刊登大量的翻译类作品，作品内容包括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学说、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学说、时事政治与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其方法论。^{[2]12-13}到世纪之交，湖南社会开始近代化转型，与此同时，官办学堂蓬勃兴起，近代湖南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世风民气进一步发展，湖湘知识分子群体较早觉醒，四大连续性人才群体结构形成。这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早期译介传播提供了经济、政治、组织、人才各方面的条件。当时的中国社会内忧外患危机四伏，“救国图存”成为当时最为紧迫的社会问题，一大批仁人志士向海外寻求救国良方，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历史语境下走进来。

¹ 收稿日期：2022-07-12

基金项目：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研究”（项目编号：19BKS158）；2022年度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一般项目“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早期传播及其中国化研究（1902-1927）”（项目编号：XSP22YBC212）

作者简介：李慧君，女，湖南益阳人，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在湖南早期译介与传播的第一阶段是马克思主义的自发译介与传播阶段，这一阶段的传播多为传播主体零散的自发传播。这一阶段从1902年李大维翻译《社会主义》延续到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胜利。1902年4月，湖南武陵人李大维翻译日本社会主义研究会会长村井知至所著的《社会主义》，详细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及其学说。1902年8月武陵人赵必振翻译日本著名社会主义思想家幸德秋水的批判帝国主义的著述《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同年1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赵必振所译《社会主义广长舌》，宣传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1903年8月赵必振所译日本福田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出版，在当时属于最为详尽地介绍社会主义的各个流派与思想的译著，被誉为“近代中国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译著”，赵必振被誉为中国“译介社会主义学说的第一人”。^[3]这一阶段的译介多为译介者的自发行为，虽然零散不成体系，但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随着湖南教育近代化的步伐，一批有近代化意向的知识分子出现，湘学会、南学会、华兴会、共和协会等社团组织不断涌现，先进的湖南人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纷纷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与此同时，湖湘学术与人才中心伴随着经济重心南移，湖湘知识分子群体较早地接触到西方民主思想，催生了湖南“革命群体”的形成。这一阶段的传播以译介马克思主义著述为主，译介主体包括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进步知识分子、无政府主义者等。在湖南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开始翻译马克思学说，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为早期译介传播的主力军。这一时期，一批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在湖南兴起，当地商品经济得到发展，随之产生了中国最早的工人阶级。五四运动以后，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显示出自己的强大力量，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奠定了阶级基础。

第二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自觉译介与传播阶段，从191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延续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阶段传播者开始有意识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李季、李达、蔡和森、杨昌济、毛泽东等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翻译和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五四”以前2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文章里涉及或译介过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鳞半爪。这些虽然也传入湖南，但未能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未对萌发中的工人运动产生实际影响。^{[4]55}“五四”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转折点，湖南地区翻译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队伍得到壮大，共产主义者开始大规模宣传共产主义理论宣传，学习马克思主义真正形成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5]1920初毛泽东、何叔衡创办长沙文化书社，成立俄罗斯研究会，宣传新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成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蔡和森与毛泽东在思想和理论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重大贡献，湖南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出现了崭新局面。^[6]这一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中译本出版，主要译自俄文和法文，报纸杂志上译介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大幅增加。蔡和森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通过“猛看猛译”先后翻译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原著，在留法学生中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以书信形式直接向湖南输入《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他依据《共产党宣言》的重要论述，结合中国实际来研究分析中国革命问题，提出组织中国共产党、开展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李季翻译《价值、价格及利润》、《社会主义思潮及运动》、《通俗资本论》、《法国革命史》、《社会经济史》、《社会主义史》、《工团主义》等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学说。^{[2]25-29}李达翻译《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说》等，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7]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曾评价李达是“我国有系统地传播唯物史观的第一人，他的《现代社会学》一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最早的一部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系统论述唯物史观的专著。”^[8]“五四”运动爆发后，湖南的新文化运动发展成为与反帝反封建相结合的运动，运动锋芒指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毛泽东、蔡和森等组织成立新民学会、俄罗斯研究会，创办了文化书社，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文化书社的成立对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翻译与传播起到巨大推动作用。《文化书社缘起》指出：“只有苏俄的文化才能算是新文化，号召大家传播这种新文化，使它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文化书社的重要任务是传播新文化，凡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书刊，都在传播之列。文化书社尤其注意推广销售《共产党宣言》、《马格斯经济学说》、《科学的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读物，还建议读者组织“小小读书会”，交换阅读，交流心得，探索“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途径。

第三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在湖南有组织地译介与传播阶段，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中国化阶段。这一阶段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直至1927年7月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湖南先进分子在实践中进行了多少次反复比较，最后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真理。据李达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思想准备非常之快，因为中国人民已经经过了多年的教训，完全懂得别的路不行，非走俄国人的路不可。”^[9]这一时期国内译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队伍得以壮大，李达、任弼时、李立三、罗亦龙等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锋。1921年李达翻译马克思经济学基础著作《资本论入门》，1923年翻译《德国劳工党纲领外批评》，

同年撰写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详细介绍《共产党宣言》；此后他还翻译出版《反杜林论》、《马克思经济学基础》。任弼时翻译列宁的《中国战争》，与一峰合译《马克思主义浅说》。李立三翻译列宁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罗亦农翻译《世界革命中之农民问题》等。^{[2]27}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何叔衡在湖南积极发展党员，10月10日建立中共湖南支部后，迅即从多方面开展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同年湖南自修大学在原船山学社旧址创办，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早期译介传播效果显著，为后来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湖南早期译介传播的经验清楚地表明谁是中国革命的主角和决定性力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反复调研，从中国实际出发，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去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并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二、马克思主义在湖南早期译介与传播的鲜明特征

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早期译介传播具有鲜明而生动的实践性。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进入湖南传播就不仅仅只是被当作一种纯粹的理论进行学术研究，而是被当作一种有鲜明实践性特色和救国效能的良方来指导社会的根本改造。马克思主义与湖南早期先进分子炽热的“救亡图存”爱国情感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最初被介绍到中国时，湖南的无产阶级尚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还不具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条件。当时湖南的有识之士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种种弊病，希望向西方寻求医治这些弊病的方法。李达曾说：“当时我们就像在漫漫长夜里摸索道路的行人一样，眼前是黑暗的，内心是极端痛苦的。”^[10]俄国十月革命使中国看到了光明和希望，马克思主义来到了近代中国这片最适宜的土壤，种下传播的种子直至开花结果。当时湖南有自己独特的现实需求，这种现实需求建立在湖南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现实发展的基础之上，促使马克思主义在湖南扎根。马克思主义进入湖南地区之后与当地的工农学运动紧密结合，应用于当地的具体环境，成为当时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1919年共产国际和苏俄派遣代表来中国，直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传播实践活动。^[11]1920年陈独秀将建党和起草共产党宣言等情况告诉毛泽东，委托其在长沙建党，当年冬天，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在长沙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10月，成立中共湖南支部。^[12]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国内六个共产主义小组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同湖南工人运动实践紧密结合的产物。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突出优势，在实践中应用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早期译介的内容选择和意义重构是早期译介影响下马克思学说在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下延续与重生的过程，早期传播者通过翻译调适和传播取舍建构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思想内涵，进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揭示了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互融和重构。马克思主义在湖南一开始便是作为指导当前行动的直接指南被接受、理解和运用的，它在湖南译介传播的过程中所展现的一直是这种实践性性格。

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早期译介传播具有明显的选择性，这也使得早期译介传播整体上处于比较零散、碎片化的状态。早期译介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塑造有着重要影响，湖湘文化崇尚经验理性和追求知行合一的文化传统，决定了早期译介将文本的政治意义置于其他价值之上。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传播的初期，翻译文本的忠实度并不是最重要，译者(受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影响)的摄取才是重要因素。^[13]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尚未对中国产生直接影响，一些思想先进的进步人士开始选择性翻译马克思主义。翻译过来的阶级斗争学说并不单纯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学说，而是转化为实现社会变革的思想手段。如此马克思主义传播初期在内容选择上具有较大随意性，翻译取舍和意义重构之间马克思主义各学说被拆解重组，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经由翻译进入异质文化的重构过程。经过这个过程马克思主义逐步融入中国文化，早期译介传播的内容逐步深入人心。“五四”后湖南青年纷纷成立社团，以组织宣传演讲、辩论出刊等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虽然早期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有限，当时人们还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但早期译介传播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不容小觑。湖南早期译介传播响应了转型时期湖南社会语境的需求，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的译介传播为其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接受奠定了思想基础，开启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

湖南早期译介与传播的主体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和坚定的革命性。湖南早期译介传播主体既有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又有无产阶级、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进步社会人士等。早期译介传播主体涌现出很多杰出代表，如赵必振、萧三、李达、蔡和森、毛泽东、任弼时、罗亦农等，后期他们大多成长为党和革命事业的重要领导人。1902年马克思主义在湖南早早出场，并迅速借助于多种方式散播开来。早期传播主体通过创办报刊杂志大量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文献。五四运动后，早期传播主体创办大量进步报刊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其中主要传播阵地有《湘江评论》、《新湖南》、《湖南通俗报》

等,《湘江评论》被公认为是五四时期湖南最出色的革命刊物^[14]。早期传播者创办的新民学会、健学会、俄罗斯学会等,为宣传马克思主义、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发挥了重要作用。^{[12]72}早期传播主体开展的纪念马克思诞辰一百周年等活动极大扩散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范围,影响了后期的自治运动和工农学运动,如促成长沙行业工人多次大罢工、学生开展抵制日货活动等。在他们的影响下,很多马克思主义的初次接受者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之后接受了它的主张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这使得早期译介传播受体具有被动接受者和积极传播者的双重属性。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受体不仅包括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更包括广大工人和农民群众。毛泽东在受众的选择上,既注意到先进知识分子,又注重广大工农群众,给他们足够的尊重。恩格斯曾指出,“我们向他们提供了一种科学的解救方法,既然他们都会阅读和独立思考,他们很快就觉悟了并加入我们的队伍。”^[15]早期译介传播的主力军具有坚定的革命性,很多传播者以生命为代价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主张。蔡和森长期在湖南从事马克思主义译介传播活动,与毛泽东一起组织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大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主义传播受到很大限制,蔡和森仍多方奔走组织工农运动,后不幸遭叛徒出卖被捕牺牲。毛泽东在致罗章龙的信中说自己把“用马克思主义改造社会”作为立身信条。他冒着重重危险出版宣传马克思主义著作,主办党的理论刊物,撰文揭露军阀统治者的种种罪行,戳穿赵恒惕政府的阴谋,表现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大无畏的战斗精神。^{[16]115}

马克思主义在湖南传播的开始时间早、译介成果多、传播范围广、后续影响大,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上的“标本”之一。早期译介传播明确地服务于历史和社会需求,回答了当时广大工农民众关心的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在湖南被普遍接受和广泛传播。湖南先进知识分子注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的学习和传播,通过“马列主义原本,大大改善了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真谛的理解”^[17]。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内容是全面、准确、深刻的,既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特点,也具有长远历史眼光。早期传播也具有一定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同传播主体取舍不同,侧重点不一样,带有较强主观性,导致早期传播内容各有侧重,对错搀杂。二是湖南早期传播者立场各异,目的不同,传播效果参差不齐。^{[18]36}译介者除了无产阶级,早期传播者既有外交官,又有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有无政府主义者。资产阶级改良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明显存在偏差。^{[16]91}三是传播初期译文底本主要来自日本渠道,它们大多是转译而来,转译过程中难免存在误译、漏译,直接从英文、德文、法文翻译过来的著述很少。日本渠道是早期湖南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主渠道,这种情况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逐渐改善。^{[18]37}尽管如此,湖南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主体的活动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做出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

三、马克思主义在湖南早期译介与传播的效果与启示

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早期译介与传播为后期革命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湖南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重要源头,这一地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译介和传播界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初语境。湖南早期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学说所作的介绍宣传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了解,为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和深入传播做了必要的铺垫。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著述在湖南的传播有限,加之第二国际歪曲马克思主义,把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排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外,把民族问题限制在“文明”民族的狭隘圈子之内,人们很难有机会接受和理解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经历了与反动思想的三次大论战,逐步明确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早期译介传播活动的广泛宣传和大力普及,使人民群众的理论水平不断提高,革命斗志日益坚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早期译介传播促使湖南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迅速完成世界观的转变,转化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并面向广大工人农民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马克思主义满足了当时湖南社会“救亡图存”的理论需要,在湖南实现了与当地社会实践结合,催生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萌芽的重要理论成果,产生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湖南地区的早期传播有其不可多得的历史经验,有着切实关注国家民族命运和民生疾苦的传播取向,形成了一大批具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传播中坚,为建立中国共产党和后期革命取得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早期传播促进了湖南地区工农学运动蓬勃发展。湖南的先进知识分子了解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后,使用它来观察中国社会,并投身到革命实践中去。毛泽东曾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19]1921年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在长沙正式成立,随之组织了9次工人罢工。当时湖南农民大量加入农会,

造成了“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20]在中共湖南支部指导下，工人夜校、工人补习学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全省各地广泛创办起来，农协会员人数激增，工人农民的思想觉悟大大提高。1926年，湘江学校率先增设农运讲习班（29人），学制半年。据不完全统计，从1926年冬至1927年5月，有浏阳、醴陵、岳阳、长沙、宁乡、湘乡、衡山、衡阳、常德等30多个县举办农运讲习所、研究所和训练班。1926年12月新化锡矿山矿工会夜校创办16班600多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开办工人夜校7所，设立10多处读书处，学员2300多人。1926年12月湖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人教育决议案》强调“全省总工会随时开办工人运动训练班”、“各工会须尽量设立工人补习学校”、“各行业之公有产业，应酌量提拨开办工人补习学校或工人子弟学校”。从长沙、安源发展到全省各地工厂、矿山和手工业，都开办工人补习学校，如长沙泥木工会、人力车工会、制笔业工会、铅印活版工会等都创办了工人夜校或工人补习学校。1927年1月省总工会创办的湖南工人运动讲习所，训练学员80多人，由中共湖南党的负责人李维汉、郭亮、夏曦等任教，出版了《湖南工人运动讲习所》半月刊；创办工人俱乐部4处，工人学校9所。^{[4]226}马克思主义在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发展结合的同时，也推动了湖南学生运动发展壮大。湖南学生联合会表现了坚强的战斗性，有力地推动了学生运动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传播。^[21]1919年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后，不断领导学生进行罢课。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当时湖南处于军阀割据状态，张敬尧竭力遏制革命斗争的爆发，毛泽东紧密联系新民学会会员及各学校学生骨干分子，广泛和新闻界、教育界人士交换看法，引导湖南人民支持北京学生，反对卖国外交。^{[22]401}湖南留学生群体也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重要力量，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湖南地区的传播。毛泽东指出：“数十年来中国已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辛亥革命前的留学生运动……就是明显的例证。”^[23]他们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早期译介传播加速了湖南地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和扩展。毛泽东和蔡和森对党的性质、党的指导思想和党的组织纪律的观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同时又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思想的萌芽，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湖南的建党活动，在毛泽东、蔡和森建党思想的指引下取得丰硕成果。1920年春，毛泽东与李达、邓中夏等马克思主义者频繁接触，5月，他与陈独秀多次讨论有关马克思主义和改造湖南的问题。毛泽东后来说陈独秀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4]238}关于建党一事，陈独秀确定“湖南由毛泽东负责”。1921年6月，毛泽东、何叔衡赴上海，代表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4]68}此时，全国有党员50余人，其中湘籍党员近20名，有李达、邓中夏、罗章龙、李启汉、林伯渠、何孟雄、缪伯英、李中等人。会后，毛泽东、何叔衡回到湖南，积极发展党员。1921年10月10日中共湖南支部建立。毛泽东回忆“那年十月，共产党的第一个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我是委员之一。接着其他省、市也建立了党组织。”^{[24]238}湖南支部有党员10人以上，毛泽东任书记。湖南支部成立后，迅即从多方面开展工作，成为全党领导得力、组织严密、工作出色的地方组织之一。陈独秀代表中央向党的“三大”作报告时特别指出，党的工作“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做得很好”。^{[4]68-69}湖南党组织壮大后，注重在马克思主义实践活动中教育民众树立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进一步巩固其思想和理论基础。如在列宁追悼大会、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大会、五四运动纪念大会、五五马克思诞辰纪念大会、苏俄革命纪念大会、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纪念大会等重要纪念日委派党的负责人以大会主持人的身份作宣传讲演。在长沙举行的列宁追悼大会上，郭亮介绍列宁生平事迹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在活动现场发行列宁纪念册10000份，散发宣传单和列宁像5000多份。

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广泛深入传播推动了湖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群体的形成，加速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湖南革命者积极投身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洪流，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和历史责任感，体现出当时湖南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世风民气。马克思主义作为极具战斗力的学说，对湖南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大有感召力。五四运动以后，在毛泽东、蔡和森等领导的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推动下，长沙出版了10多种宣传新思想的刊物。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创刊号于1919年7月14日出版，刊物形式上为报纸型四开一张，有“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湘江杂评”、“放言”和“新文艺”等栏目，《湘江评论》的职责就在研究、传播和推行当前世界的革命新思潮。^[25]1920年以后，毛泽东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实践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1921年新年大会上，毛泽东批判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提出以布尔什维主义“改造中国与世界”。他指出：“社会政策，是补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22]23}认识到这一点后，中国人民开始有效地从事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与领导人强烈感受到革命理论对于指导革命的重要意义。湖南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有规模地译介马克思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精髓”被引进来。湖南马克思主义者群体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形成，这一群体的形成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实践意义。

湖南早期传播者针对国情译介与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扮演了马克思主义传播桥梁的重要角色。他们在译介内容上超越前期作品，大大加快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步伐，奠定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在湖南的早期译介与传播秉承一贯的实践性，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由言语片段深入到思想精髓，由片面选择趋于全面译介，对于当时启蒙国民、建构价值引领和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王继平. 晚晴湖南史[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4:491.
- [2] 张旭. 湘籍近现代文化名人·翻译家卷[M].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 [3] 张旭. 近代湖南翻译史论[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4:190.
- [4] 宋斐夫. 湖南通史: 现代卷[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
- [5] 林代昭, 潘国华.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 上[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3:1-2.
- [6] 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编. 湖南人民革命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M]. 长沙: 湖南出版社, 1983:2-3.
- [7] 李达文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4.
- [8] 江明. 展读遗篇泪满襟——记李达和吕振羽的交往[J]. 文献, 1980(4):12-22.
- [9] 胡绳武, 金冲及.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406.
- [10] 李达文集: 第四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8:732.
- [11] 高军. 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16.
- [12] 湖南革命史词典编辑委员会编. 湖南革命史词典[M].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 [13] 王克非. 翻译文化史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6.
- [14]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湘江评论: 新湖南新时代[M].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5.
-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9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 692.
- [16] 宋镜明, 吴向伟. 党的重要历史人物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 [17] 李军林.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及其话语体系的初步构建[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13:45.
- [18] 顾海良. 马克思在中国[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8.

-
- [19] 徐义君. 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开端[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427.
- [20] 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14.
- [2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 第二集(上册)[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出版社, 1959:380.
- [22] 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 新民学会资料[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 [23] 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641.
- [24] 斯诺. 西行漫记[M]. 董乐山, 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
- [25] 郝安. 从湘江评论到新湘评论[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2.